

國書叢民

第二編
· 93 ·

鄧演達紀念集

Z121/071:2(93)

上層書局



91154286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93 ·
綜合類



鄧演達先生遺稿
鄧演達紀念集

鄧演達著
毅君編

上海書店

鄧演達著

鄧演達先生遺稿

本書據1932年版影印

卷之三

目錄

卷之三

目錄

卷之三

目錄



鄧演達先生遺像

鄧演達先生傳略

繼承孫中山先生中國革命的使命，站在廣大的勞苦的農工平民大眾的立場，革命的領導者鄧演達先生，於民國二十年某月日被反動的南京統治——主犯蔣介石及其同僚，走狗——所殺害而與世長辭了。在這外侮日亟，軍閥橫行，民生憔悴的今日，竟失去中國革命的唯一導師，瞻念前途，曷勝悲痛！先生盡瘁於中國革命，一生艱苦奮鬥，不避勞怨，其對於中國革命的忠實，凡知其人，無不起敬。近年來先生研究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正得到結論，領導農工平民羣衆與反動的統治開始鬥爭，無恥的殘酷的敵人在牠沒落的途徑中，竟用卑鄙的手段賊害了中國垂危的民族生命的象徵！在先生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爲民族解放而犧牲，是算盡了責任，而他的一生革命事蹟，却是革命後死者的典式，他的革命任務，却待革命的後死者去完成！爲着永留後蹟規範；爲印證中國革命的途徑，爰述先生的事略如下：

一 革命的童年

先生諱演達，字擇生，廣東省惠陽縣人。其所居，係惠陽縣的鹿頸鄉。從小便生活于農民區域中，該處社會組織殊為特別，與其他農村區域不同，就是地主和佃戶，區而處，有所謂地主區，又有所謂佃戶區。地主與佃戶間的界限極嚴，因此地主壓迫佃戶的現狀，遂曾見疊出。加以地主區的人們，豐衣足食，優遊餘裕，而佃戶區的人們，則胼手胝足，鳩形鵠面，苦樂的懸殊特甚。先生適生是鄉，童時對於地主的橫暴與佃戶的困苦的印象甚深，遂構成先生的農民革命思想及土地革命思想的最原始的基礎。先生出世，適當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之後，當時國人受二次戰敗的創傷，對於國際的地位以及中國的國勢，已漸漸明瞭。且適值革命運動。活躍甚烈，革命黨人，時常將中國國勢的凌夷與帝國主義的侵略，向農村方面宣傳，先生耳濡目染，遂又種下先生的民族解放思想與反抗帝國主義思想的胚胎。當時先生已獲得了革命的基礎，又

因與革命運動接觸的機會極多，於是在八歲時，即參加革命的實際行動。先生以年幼，常隨姚雨平輩作交通員，往來於廣州佛山間，所有一切祕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經手傳達，機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黨員皆亟加稱許。因中法中日戰爭之後，先生習染於革命黨人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富國強兵的思想，所以年稍長即志在做一個有用的軍人。這就是先生學習軍事學的動機。

二 革命的準備時代

先生十二歲時，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爲同學中的最年幼者。但先生聰穎奮發，輒爲師友輩所驚奇，鄧仲元先生，尤器重，至目爲奇才。辛亥之役，先生隨北伐軍出發，在姚雨平軍中，初露頭角。南北議和，民國建立，先生復回粵重修軍事學，畢業於廣東陸軍速成學校。但當時中國政治在袁世凱的軍事統治之下，黑暗萬分，革命勢力逐漸失敗，先生感覺異常煩悶，卒又於民國三年進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從事於

經然科學的研究。中間，袁氏稱帝，繼以北洋軍閥的專橫跋扈，中國政治愈加黑暗，經濟愈加破產。先生不勝憤激，擬棄其所學以從事工業，但限於家庭經濟，終未果。民國五年冬，預備學校畢業，升學於保定軍官學校，於研究軍事學之餘暇輒致力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民國八年，畢業於保定軍校，被派赴邊防軍入伍見習，充下級將校，旋即由鄧仲元先生召回漳州，使統率憲兵，於是先生脫離學校生活而努力革命事業了。

三 初期的努力

孫中山先生令陳炯明由漳州率師回粵，驅逐舊桂系，先生亦率領憲兵隨軍出發，及廣東恢復，鄧仲元先生成立粵軍第一師，先生即任師部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團結上下羅致人才，仲元先生倚如左右手。當時先生即知陳炯明輩的跋扈，是終不能為革命努力的，只有努力培植第一師的基礎，使第一師成為革命的武力，並以牽制陳軍，使不敢有異動。先生深知仲元先生之心，仲元先生亦深知先生之才，二人互相倚重

，以發展第一師所担负的革命事業。不久，先生又受命組織工兵營，悉心經營，努力訓練，全營精神奮發，終成爲各團營的模範，於是粵軍第一師的基礎，也就很穩固了。當時陳炯明已漸漸不能服從孫先生的指揮，對於孫先生的革命事業的發展，每多方掣肘，而且漸漸發露其軍閥刮據的主張，隱然以廣東爲已有。粵軍第一師，隨着鄧仲元先生與先生的措置，每左右其間，使陳炯明的陰謀屢欲發而屢止。粵軍第一師因對於革命多方維護遂遭陳炯明之忌。陳炯明知粵軍第一師必阻撓他的逆謀，但當時陳炯明受環境的影響和私慾的支配，逆謀已有不能復已之勢，故首謀消滅粵軍第一師，而鄧仲元先生終於被刺。鄧仲元先生被暗殺以後，先生悲痛着知已的慘死，報仇心急，且深知革命的唯一希望在維持第一師，因假其全力鎮壓軍心的搖動，陳炯明終莫可如何。

四

革命的護持者

革命的護持者，軍人以爲最要。因國十一年，北洋軍占人東西，東陽

孫中山先生知陳炯明終懷異志，且知先生對於擁護革命，夙具決心，於是特將先生所統率的獨立營改編為警衛軍，以警衛總統府。民國十年，北伐軍已入廣西，陳炯明益攬權跋扈，扣抑餉械，使北伐軍不能發展。及孫先生由桂回師。陳炯明退處東江，第一師因先生的斡旋，首先擁護孫先生北伐主張，全部出動，民國十一年北伐之役才能實現。北伐軍向北推進，第一師前鋒已過贛州，而陳炯明嗾使葉舉等圍攻總統府的事變忽起。這種消息傳到前方，因不明真相，各部隊均發生動搖，第一師亦竟無法維持，先生乃急會同陳銘樞部第四團，由信豐退據河源。先生自己則潛赴香港轉上海，見孫先生，商量善後辦法。後陳銘樞辭去軍職，學佛於南京，先生則連合陳濟棠張發奎等形成新的團結，整理軍隊，相機圖再舉。十一年冬孫先生檄調楊希閔劉震寰等滇桂軍東下驅逐陳炯明，第一師首先響應，滇桂軍遂兵不血刃而佔廣州，然第一師亦從此分化矣，先生毫不顧惜，與諸將領商議結果，將軍隊重新編配，推李濟深為師長，先生而任第三團團長，於軍中多所建樹，使第一師及其所孕育之第四軍在國民革命軍

中建立不少的功績，論者每以先生的努力爲多！陳炯明的殘部既被逐出廣州，仍盤據東江一帶，而楊希閔劉鎮寰等羽毛已豐，則又復飛揚跋扈，把持財政，劫奪稅收，無所不爲，革命局面復陷於困頓的境地。孫先生因處廣州，一籌莫展，因爲驕兵悍將，早已不復知有孫大元帥，更不復知有所謂革命了。先生於此時並不畏難，益艱苦奮鬥，最先想法使第一師討滅沈鴻英殘部，馮葆初等，由江門四邑漸漸移入西江一帶，然後極力啓導廣西新興將領黃紹雄白崇禧等以革命大戰，與取得相當的聯絡，於是由此肇慶以至梧州連成一氣，聲勢益壯。楊希閔劉鎮寰范石生等於這種威脅之下，乃稍稍歛抑，而孫先生也可以從容佈置了。在這時期先生作事，每獨任其勞而使他人受其名，艱苦卓絕，任勞任怨，但先生的精神與魄力，不特爲同儕所信服，亦且爲反對的敵人所欽敬了。

五 黃埔軍官學校的建設

孫先生當時外受陳炯明等的攻擊，內受楊希閔等的挾持，感覺到非訓練革命的武力，決不能建立革命的基礎，並以消除黨內的反側，乃與先生等商辦黃埔黨立陸軍軍官學校。並欲使先生任訓練部主任，先生力辭，卒推李濟深居正而自爲其副。黃埔軍校開辦之後，所有人才的招致，訓練的規劃，都由先生主持其間，悉心經營，不遺餘力。

軍校開始時學生不過四百多人，在其所屬的社會成份上說，十之八九是小有產者，鄉村小農的子弟也不在少數。但在當時的複雜的政治環境——楊劉霸佔廣州時代——與全國的凝固及腐朽的政治局勢中，頗足以激勵大多數青年的憤激與努力。先生在這時候盡力於國民黨革命任務的宣傳與訓練，構成當時黃埔學生的靈魂——因爲得着了這點靈魂，所以在後能和陳炯明的殘部及楊劉作戰所向無敵，發揮時代的機能，就是這種原故——這時候學生對於先生的愛戴，和先生對學生的嚴肅與慈愛，構成當時的革命中心團結。校長蔣中正深忌先生，轉倚王柏齡爲心腹，王柏齡又援引何應欽等，深相結納，隱然對於先生取一種敵對的形勢。先生以革命事業久受軍閥的摧殘壓迫，

不能有所建樹，乃悉心經濟黃埔軍校，希圖造成革命的武力，以保障革命前途的發展。而此時目擊着這純粹的革命武力，又漸漸爲蔣中正等所刦持，轉趨上軍閥的途徑。於是先生翻然感悟，知中國的革命事業，應從政治的解放以達到國家建設，乃決然辭去黃埔軍校職位，而出洋赴德學習政治經濟。先生出國未久，孫先生便逝世，黨內形勢日非，革命前途危險，乃不得不忍痛放棄未成的學業，於十四年冬又回到國內來。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對於整個革命方略，多所貢獻，被選爲第二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時王柏齡任黃埔軍校教育長，百事廢弛，精神不振，蔣中正知欲把黃埔學生訓練成材，非復用先生不可，乃強邀先生回校繼王柏齡任教育長。先生再就任教育長後，蔣中正每事邀結先生歡心，先生雖知道蔣中正包藏禍心，但冀以革命大義糾正他的錯誤，每遇事直陳，不顧忌諱。蔣氏雖心不以爲然，但終以欲用先生之才，而極力敷衍。

六 革命的煩悶期

初先生離國後，蔣中正已逐漸鞏固其在軍校的勢力，並隨着勢力的增大，而逐漸顯露他軍閥的面目。十四年秋蔣氏藉廖仲凱先生被刺案，逐去胡漢民，把廣東政府的政權，逐漸刼持操縱，使變爲他私人的勢力。是年冬，先生回國，復任黃埔軍校教育長，乃希望蔣中正會翻然覺悟，改變他的軍閥的行爲，故悉心經營，訓練學生。王柏齡不自知其拙，因失位而深恨先生，並多方勾結一般腐敗份子，向蔣氏包圍，以攻擊先生。蔣氏亦以自己羽翼已成，雖先生力陳革命利害，每不以爲意。三月十二日之變，是蔣中正試演獨裁的第一幕，但以師出無名，不得不藉名排共。事變發生以後，王柏齡輩圖中傷先生，挑撥蔣氏的猜忌，將先生調任汕頭軍校校長兼第一軍黨代表，而陰使他的黨羽羣起反對，以威脅先生。北伐戰起，蔣中正因事實上的需要，強先生任總政治部主任，以緩和革命份子對已的敵視。先生亦希望從北伐的進展中，發展民衆

本身的力量，以制裁軍閥的繼起，中興革命的力量，遂毅然允諾擔負這最有意義的繁重工作。

七 北伐途中

在北伐開始的時候，先生對部屬說：「我們應該要明白中國的農工平民大眾，受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二重束縛，我們此去是要喚起廣大的農工平民大眾自己起來解放自身的痛苦，同時我們要剷除軍閥制度，永絕的國禍亂的根源，我們更要注意並防止我們自己造成爲軍閥的趨向。」只在他這幾句話裏面，我們就可以明白他的意向和苦心了。北伐軍因唐生智的轉變而順遂地進行，就愈和吳佩孚的軍隊相接近。先生在途中，除主持總政治部事務，使部員努力調查沿途的農民生活狀況及土地分配情形外，復兼管行軍參議事項，所以先生的事務至爲忙碌，常徹夜不寐，平日又復趨程前進，部員多有因精力不支而病的，但先生却精悍如常。先生在征途中，在軍事的百忙中，

猶不忘他畢生所念念不忘的農民問題，他組織農民生活調查團及農民問題研究會，雖然在百忙中沒有具體的表現，但他對於解決農民問題的努力和系念，在當時的革命軍中實為僅有之一人！吳佩孚敗後，劉玉春陳嘉謨因守武昌城，屢攻不下。先生任攻克司令，親臨城下指揮，槍彈如雨，屹不為動，後武昌城卒於國慶日克服，先生過漢口洗澡，脅肉盡爛，其任事之艱苦卓絕有如此者！

八 武漢政府的組織

武漢已下，先生被任湖北省政府主任，經營擘劃，鞏固革命的新領土。時北洋軍閥開始崩潰，被壓迫的民衆們驟然失去了重壓，民衆運動勃興起來。特別是在武漢，因為當地的工商業者有相當的基礎而經濟及政治又足以綰轂長江各省，因此，在武漢的政權掩護下的民衆運動，自然可以推進并影響全中國的主要地區。民衆起來的信號到了，這足以動搖軍閥的基礎，並可由民衆的力量，發展革命的事業，先生在這時候